# 臺灣學者新出中國文學史之敘述體例的特點——以王國瓔和龔鵬程著作為例

李騰淵（Lee, Deung Yearn）

韓國國立全南大學中國語文系教授

漢學研究中心獎助訪問學人

綜觀 20 世紀中國文學史學史，自俄國瓦西里耶夫（Василий Павлович Васильев, 1818-1900）的《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（中國文學史綱要）》（1880）以來，至今出版的各類通史、斷代史、文體史已達一千多種。其中，1950 年代以後在臺灣出刊的絕大多數文學史，則在與史觀有密切關係的意識形態上，與大陸相較之下，未有顯著的揭示或運用，可以說大多是以固有文學史體例來編纂的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近年來王國瓔《中國文學史新講》（臺北，聯經出版公司，2006，上下二冊，共 1228 頁）和龔鵬程《中國文學史》（臺北，里仁書局，上下二冊，上冊 2009 年，501 頁；下冊 2010 年，580 頁）等新著問世。兩書在體例、史觀與敘述內容有顯著的不同，各有特性，亦有共通點，如皆是個人著作，篇幅極為龐大；兩位作者都强調突破既存文學史編寫上存在的種種限界之必要性，並標榜採用「新」的體例和史觀。此點值得關注並具體探討其優缺點及得失。

王國瓔《中國文學史新講》，除了〈總緒〉外，自第一編中國文學的源頭——先秦文學至第十二編明清長篇章回小說發展歷程，共十二編，各編中又分爲數篇章節。全書文章通順暢達，邏輯井然；敘述內容中，必要時不厭其煩地與既存學說作異同之比較，並揭示著者的主張。尤其有關「小說」等各文類名稱定義問題上，一一介紹相關學說之論證，保留學術著作之貫有風格。綜觀其體例，唐代以前依據時代先後分期後提示代表作家作品，唐代以後則以詩歌、文章（含散體古文與駢儷之文）、戲曲、小說諸文類之發展演變方式來敘述。可稱之依據「一代有一代之所勝」的傳統觀念來進行敘述文類變遷史之變形方式而已，然非眞正的通史體，有種種值得商搉之問題。難免有使讀者不易掌握各時代文類間的互相交流、影響及融合過程等之嫌。總括而言，全書內容豐富，邏輯井然，但是作爲「新講」，獨自的史觀不夠明顯，還是一種綜合既存文學史的種種內容而「重編」成的較充實教科書。

相較之下，龔鵬程《中國文學史》却可稱爲眞正「新」的文學史。全書中包括「自序」與「導論：文學史的研究」，上冊自「壹、詩經的文籍化與詩篇的發展」至「伍十、被扭曲的說唱史」共 50 篇，下冊自「伍十壹、句圖與格例」至「壹佰、革命」共 50 篇，總共一百篇。作者在〈自序〉中簡單回顧以往的中國文學史 1,600 部作品中佳作寥寥無幾的現象，其最大原因應歸於「緣附於課程的先天因素」。鑑於此，著者不依照課堂講義方式撰寫此書，故是一部獨一無二的文學之史。說明文學這門藝術在歷史上如何出現、如何完備、如何發展、其內部形成了哪些典範，又都存在哪些問題與爭論，包括歷代的文學史觀念和譜系如何建構等等。文學的觀念史、創作史、批評史，兼攝於其中，因此此書與歷來之中國文學史著作完全不同。全書完全打破以朝代作為文學分期的方式，也不以文學家、名作作為標題，而以文學觀念之變化作為標題，確有其獨特之觀點。書中探討種種議題，大都是依據著者獨創的視角來進行的，暫且不論其是非與否，此種嘗試可謂是難能可貴的，是一百多年來中國文學史撰寫史上史無前例的嘗試，極為重要。但就創新層面而言，其具體內容較偏重於文學觀念和批評標準等方面，更接近文學批評史乃至文學接受史；而探討的內容主要以傳統詩文爲主，偶而言及戲曲、小說文類，相較之下比例顯然有所偏重，難免有偏向於傳統文學觀之嫌。

礙於篇幅有限，本摘要僅揭示兩書整體體例問題的概括性輪廓，而更詳細的論點將在發表當日具體舉出，先在此特以聲明。

## 主講人簡介：

李騰淵（Lee, Deung Yearn），韓國籍，臺灣輔仁大學文學碩士，韓國外國語大學文學博士，現任國立全南大學（Chonnam National University）中國語文學系教授。歷任韓國中國小說學會會長、上海復旦大學交換教授、美國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（University of California, San Diego）訪問學者等。李教授本年獲得漢學研究中心獎助，來臺灣研究主題為「臺灣出刊主要中國文學史的敘述視角比較研究」。